



《季风吹拂的土地：现代东南亚的碎裂与重生》  
[英]迈克尔·瓦提裘提斯 著  
张馨方 译  
上海人民出版社

#### [作者简介]

迈克尔·瓦提裘提斯(Michael Vatikiotis)

英国作家、记者、评论家，曾就读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，于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。在东南亚生活近40年，辗转印尼、马来西亚、泰国等地，曾任BBC和《远东经济评论》记者。现居于新加坡。著有《修剪榕树：东南亚的政治变革》《香料花园》《灵魂迷失的画家》等。

#### 热带阳光与强烈的气味

上了当与不请自来，正是在1979年初抵东南亚的心情。泰国国际航空DC-10飞机降落在曼谷廊曼机场(Don Muang Airport)，我走出机门，一阵刺鼻的有机气味与潮湿的热气迎面而来，感觉就像在高温的厨房里被人拿湿毛巾狠甩一巴掌。这场知觉的震撼洗礼，把我瞬间从西方拉到了东方世界。我坐在坚固的丰田卡罗拉后座，准备从机场前往市区，车子一路疾驶，快速经过一片又一片的稻田与好几座装饰华丽的寺庙，寺庙的雕花玻璃在月光下闪闪发亮；不久后，车子开进市区，街道旁脏乱的混凝土店面林立，空中交杂垂挂着无数电缆。这幅景象颇具后工业风，令人失望，有点像丑版的洛杉矶。第一个晚上，我下榻拉玛四世路(Rama IV Road)上的马来西亚旅馆(Malaysia Hotel)，这是背包客口耳相传的著名旅店。进到房间，只见床垫软塌凹陷，床单上沾有污渍。我闲晃到旅馆附近一间印象中名为蓝狐(Blue Fox)的酒吧，看了店家以录像带播放的电影《猎鹿人》(The Deer Hunter)。回到旅馆，我听着窗边的老旧空调嘎嘎作响，彻夜难眠。

那一年，我初次见到的东南亚，深陷冷战所遗留的创伤中。美军于1975年从越南仓皇撤退，人民一片恐慌，害怕越南军队的坦克突破泰国边境不到48小时，便会攻进曼谷市区的素坤逸路。

大众观光业与廉价航空还未盛行的年代里，外国旅客很少涉足大城市与海滩度假胜地以外的地方。我不是观光客，而是在伦敦大学主修东南亚语言与历史的大二学生。那年夏天，我迫不及待地想尽可能探索这个我选择研究却从未到过的地区，因此一到泰国，我立刻往南边的印度尼西亚前进。我飞到北苏门答腊省(North Sumatra)顶端的棉兰市(Medan)，从当地好不容易熬过48小时的颠簸车程，横越苏门答腊，探访老家在西苏门答腊武吉丁宜(Bukit Tinggi)郊区某个村落的大学同学黛维·福图纳·安瓦尔(Dewi Fortuna Anwar)。司机没有见过西方人，坚持要我坐在摇摇晃晃的梅赛

这是一部关于东南亚现代化进程及其面临问题的反思和剖析。作者迈克尔·瓦提裘提斯既是东南亚社会与历史的研究者，又是经验丰富的旁观者。他求学于伦敦亚非学院，后于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。他长期在东南亚生活，基于其亲身经历和专业背景，瓦提裘提斯从东南亚的社会症结与历史重负出发，既有对不同国家社会历史差异性的比较分析，又有对东南亚社会整体性问题背后复杂原因的深刻解读。

通过与高层精英或斗小民的对话，作者揭开了东南亚的真实面貌——深入骨髓的腐败、被舍弃的人民、愈发极端的种族和宗教偏执。凭借记者出身所特有的犀利观察和敏锐判断，作者认为东南亚困局的深层原因主要有三：一是精英分子始终自私自利；二是支持东南亚社会稳定的宽容与包容关系正在淡化；三是外在环境的变化。而对于东南亚的未来，作者的判断严谨中透露出悲观。也许正如柬埔寨的一句谚语所言，“河水高涨时，鱼吃蚂蚁；低潮时，蚂蚁吃鱼。”

## 深入东南亚核心

德斯(Mercedes)巴士前座。前排座位前是一大片布满苍蝇的挡风玻璃，我胆战心惊地看着司机把车开在陡峭悬崖旁，沿着崎岖山路蜿蜒而上。沿途多是翠绿稻田的风景，在雨水的拍打下闪闪发亮，红土田埂错落其间，犹如大地的伤口。这段可怕的旅程中，我爱上了名为“Kretrek”的甜味香烟；也是在西苏门答腊停留的那个星期里，我第一次见识到广泛而错综复杂的家族关系，是东南亚社会必要的基础。

数周后，我回到武吉丁宜以北数千公里的泰国，与当地导游在热得发烫的红土路上走了好几公里，穿越茂密丛林，来到小镇迈萨良(Mae Sariang)西边。过了几个小时，我们抵达克伦族(Karen)的山地部落。一名脸上满是皱纹的和善长者站在茅屋外的拼竹台阶上，一边抽着烟斗，一边盯着我们看，喊道：“你们怎么这么久才来？”后来我才知道，尽管我们是第一批来到这个小村落的欧洲人，但克伦族的古老传说早已预示，知识之书将由白面之人带来，原因是，当初造物主在人类诞生之际散布这本书，但克伦族人太懒惰，以致错过了领书的机会。我帮那位长者照了张相，却忘了他的名字。当然，他以为我别有意图。当时，我正经历一段终生难忘的旅程。

我对东南亚的第一印象充满了炙热的热带阳光与强烈的气味，让人只能隐约瞥见这个懵懂拥抱现代世界，却又受到古代传统与习俗局限的复杂社会。1979年的新加坡，独立尚未满二十年。比起印度尼西亚与泰国，这个国家的市容较为整齐干净，许多街道林立着两层楼的住家式店铺，飘散着浓浓的肉桂与豆蔻气味。环绕着名为“政府大厦大草场”(the Padang)的旧时殖民中心，草地修剪齐整，建筑洁白纯净，从至今犹存的板球俱乐部(Cricket Club)白漆灰泥墙往下俯瞰，一览无遗。相反地，曼谷则是建筑外墙长满霉斑的水泥丛林，外围筑有热带庭园的精致木造宅邸零星分布其中，贵族出身的政府官员早上会在庭园里用剩饭喂食池中的锦鲤，再将碎屑赏给忠心的侍仆。

#### 冲突避免机制

旅游几周后，我与同样来自伦敦的学生们待在泰国北部首府清迈(Chiang Mai)，这是一个极富田园风情的城市，每逢温暖多雾的早晨，或是落日将整片天空抹上淡粉色的黄昏时分，我总会想，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天堂。当地人优雅有礼，市区斑驳的城墙内矗立着近百座佛寺。骑单车绕城一圈，让人想起17世纪初法国耶稣会探险家在暹罗(Siamese)旧都阿育陀耶(Ayutthaya，又名大城)留下的雕刻。这座城市平易近人的魅力与喧嚣，让我开始了解东南亚社会的基本词源学。

清迈固然魅力十足，但我向往印度尼西亚，深深为它那掺杂了胜利与悲剧的民族理想所吸引，沉醉在铜锣与铙钹不和谐的敲击声中，在那里，没有一件事是表里如一的。大学毕业后回到伦敦，我申请继续进行包含印度尼西亚田野调查的博士研究。探究印度尼西亚奥秘的过程中，出身地中海东部、懂得多国语言的我，可以利用自己矛盾又复杂的西方移民身份。我写大学历史论文时，是以苏加诺(Sukarno)为题，因而我对他的生平了如指掌，我想起希腊

籍姑姑1960年代初在罗马的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担任秘书时，曾见过这位前印度尼西亚总统，还拿到一张他的签名照。潜意识里，我对印度尼西亚深感着迷。

但我没能如愿到印度尼西亚进行研究，至少当时还是如此。上一代的学者，尤其是已故康奈尔大学(Cornell University)教授本·安德森(Ben Anderson)，试图揭发苏哈托(Suharto)在1965年所谓的政变后，趁乱上位、谋杀约五十万名人的黑暗内幕，之后，独裁的苏哈托政权几乎禁止所有外国研究生入境。我转而加入一群社会科学硕士生的行列，他们在比较开放却并未更民主的泰国，费尽千辛万苦才敲开国家研究委员会(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)的大门。我花了50美元申请研究许可，而名义上研究清迈种族渊源的论文提案，让我在1982年初再度回到这座有如宝石般坐落于泰北群山间的魔幻城市。

研究期间，我接触到东南亚处理对立与冲突的特殊方式：一味避免。在泰国文化中，“面子”代表一切，是人类基本尊严的表现。在西方，一般人们认为生命的本质在于灵魂；而在亚洲，人们以更具体的方式展现自我。一旦丢了脸，自尊就会受到打击，以致突如其来暴力反应不仅理所当然，也是意料中事。因此，泰国社会与其他东南亚文化一样，也发展出复杂的冲突避免机制，包含说话拐弯抹角以免冒犯他人的病态倾向，以及在外人看来是展现高度文明礼仪，其实是用来包装失去颜面的各种行为举止。我从教训中学到，以侵犯或使他人蒙羞的方式揭露真相与现实，必然会引起不理性的极端反应。某天，在清迈大学的一场公开讲座中，我描述不肖人士贩卖泰国身份证给非法缅甸移民的知名诈骗案件。这个揭露真相的行为令当地军队指挥官大为恼火，朋友还要我小心会有生命危险。为了赔罪，我到一间佛寺，向住持捐献一笔为数不少的钱。如同古代天主教会贩卖赎罪券以拯救灵魂，丢失的颜面也可以透过物质的交换挽回。这次的经验让我在往后的日子里受用无穷。

#### 转折点

1980年代中期是东南亚政治的转折点。一切始于菲律宾，年迈的独裁者马科斯紧握权力不放。但是，这位因妻子嗜高跟鞋成痴而出名的专制君主，在1983年下令当众刺杀反对党领袖贝尼格诺·阿基诺(Benigno Aquino)时，也点燃了大众的愤懑怒火。当时，我在英国广播公司国际广播电台(BBC World Service)位于伦敦布什大厦(Bush House)的狭小摄影棚里，报道刺杀事件后随即爆发的人民力量示威运动。我毕业后进入BBC工作，曾经在这个摄影棚里担任名称乏味的新闻时事节目《24小时》(24 Hours)的实习制作人。菲律宾多数的头条新闻都发生在一夜之间，正是我值班制作新闻界所谓的“晨报”(晨间新闻)的时候。

那是有线电视刚开始全年无休的时期。马尼拉爆发的刺杀事件与示威游行，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的第一则国际新闻，当时是深夜，我正窝在布什大厦深处一间阴暗的摄影棚内，距离那些现场一万多公里远。我看到这则新闻难掩兴奋，连忙联络相关人士准备直播采访，并借

用了CNN报道的重要片段。紧接在世界新闻快报后15分钟的晨间节目，几乎都在谈论人民力量的革命。突然间，我联络到正在家中的美国众议员史蒂夫·索拉兹(Steve Solarz)，透过信号不稳的电话问他能否联机。“好啊”，他说，“但我正在上厕所。”媒体大肆渲染马尼拉的事件，急迫地推断这是亚洲历史的终点。然而，事实并非如此。

我受公司指派为印度尼西亚通讯记者之后，才开始真正接触东南亚政治。1987年5月，我再度从伦敦搭上长途班机，飞抵雅加达时，又被湿气甩了一巴掌，迎面而来的气味比上次更呛鼻。我身上带着印度尼西亚驻伦敦大使馆核发的记者签证、高阶的索尼磁带卡式录音机与一对破旧的BBC罐头(BBC cans，那个年代都如此称呼头戴式耳机)。我传回伦敦的第一则外电是印度尼西亚发射通信卫星的报道。

就这样，我告别朝气蓬勃的1980年代，挥别伦敦奇西克(Chiswick)与切尔西(Chelsea)香醇的白酒与鸡尾酒，展开东南亚驻外记者的生涯。但是，我对印度尼西亚的了解有多少？

并不多。我花了几个月学习基础印度尼西亚语，也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(SOAS)图书馆的阅览室里，阅读康奈尔大学知名东南亚政治与历史学者安德森与鲁思·麦克维伊(Ruth McVey)的著作；为了研读有关失落文化的隐晦文章，转而参考说教意味浓厚、书页发霉的合订版《皇家亚洲文会会刊》(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)；看了好几遍《危险年代》(The Year of Living Dangerously)，研究SOHO区脏乱的贵都(Equatorial)酒楼里用来装沙嗲(satay)或印度尼西亚色拉加多加多(gado-gado)的特殊餐盘。如此浅薄表面的知识与经验，几乎不够我应付排山倒海而来的都市事件与感官刺激，以及1987年雅加达盛行的诡密阴谋与官僚乱政。

初到东南亚的那几年，我不断修正自己在伦敦学到的历史，同时努力安抚亲友们无声的恐惧与担忧。有太多太多事情不如我们想象。

之后五年，我走遍印度尼西亚各地，从巴布亚省(Papua)蚊虫猖獗的马老奇市(Merauke)到亚齐省(Aceh)的沙琅(Sabang)深水港。苏哈托政权的发展计划引发的不可思议的影响，处处可见，譬如，几乎每个村庄都设有发放基本用药与避孕药的小诊所。苏哈托体型肥胖，有着一头灰发和粗短双手，经常可以看到他与戴着筒帽草帽、笑得合不拢嘴的农夫说话，考察以他名义创建的基金会是否确实发放补助给农民。当时，我也听过人们抱怨生活受到禁锢、喘不过气，因为他们不可以表达心声。军方势力无孔不入。在军队所谓的“双重功能”下，所有政府部门的在职官员都是国会成员，作为中央以至地方的强大行政支柱。行事正直的地方官员可能会因为民服务而备受爱戴，这种人大多在军人同侪中显得廉洁，且遵循一丝不苟的王室纪律。他的官邸一尘不染，庭院的草木修剪齐整，制服烫得笔挺，每天早晨都行升旗礼。实际上，他是怠惰的陆军上校，因为犯了错而被调到脏乱的落后地区，在当地施行暴政。

(本文摘自《季风吹拂的土地》第一章，注释从略，小标题为编者所加)